

从“行政映射”到“学术考证”再到“文化回归”：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大唐西域记》职官术语百年英译的范式更迭

杨志通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7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25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9日

摘要

《大唐西域记》作为记述中亚、南亚及中国西域史地信息的巅峰之作，其职官术语的翻译，不仅是跨语言的转换，更是不同时代学术规范、出版要求与目标读者接受度制约下文化交流与知识建构的缩影。本文以译者主体性为理论视角，在阐释的自主性、创造性重构、以及主体的受动性与能动性平衡三个维度下，对比分析了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 1884)、托马斯·沃特斯(Thomas Watters, 1904)与李荣熙(Li Rongxi, 1996)在职官术语英译中的策略差异。研究发现：比尔受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学术规范与出版要求的制约，通过行政映射进行功能性调适；沃特斯受当时实证主义学术思潮与汉学规范驱动，通过详尽考据进行学术操纵，试图构建科学的东方知识体系；李荣熙则在当代国际学术规范与全球化传播语境下，通过术语的规范化转换，实现了向学术本位的回归。职官术语译名的范式演变揭示了译者主体性在跨文化翻译中的运作机制，为中国典籍的国际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镜鉴。

关键词

《大唐西域记》，职官术语，译者主体性，对比研究

From “Administrative Mapping” to “Academic Textual Research” to “Cultural Return”: Paradigm Shifts in the Century-Long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Official Titles in *The Great Tang Dynasty Record of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文章引用：杨志通. 从“行政映射”到“学术考证”再到“文化回归”：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大唐西域记》职官术语百年英译的范式更迭[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166-171. DOI: 10.12677/ml.2026.149910

Zhitong Y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22, 2026; accepted: August 25,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9, 2026

Abstract

As a monumental work documenting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of Central Asia, South Asia,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of ancient China, the translation of official titles in *The Great Tang Dynasty Record of the Western Regions* (Da Tang Xi Yu Ji) is not merely a cross-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a microcosm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constrained by academic norms, publishing requirements, and target readers' receptivity across different era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and acros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terpretative autonomy, creativ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ranslator's passivity and agency, this paper comparatively analyzes the strategic differences among Samuel Beal (1884), Thomas Watters (1904), and Li Rongxi (1996) in translating official titles into English. The study reveals that Beal, constrained by the academic norms and publishing requirements of the Victorian era in the 19th century, made functional adjustment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mapping; Watters, driven by the positivist academic trend and Sinological norms of his time, conducted academic operations via exhaustive textual research in an attempt to construct a scientific system of Oriental knowledge; whereas Li Rongxi, under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norms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achieved a return to the academic standard through the standardized conversion of terminology. The paradigm evolution of translated names for official titles reveal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i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providing both theoretical ground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words

The Great Tang Dynasty Record of the Western Regions, Official Titles,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Comparative Stud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大唐西域记》作为唐代高僧玄奘口述、辩机撰文的史地巨著，详尽记载了玄奘西行途中所历百余国的政治体制、疆域范畴及风土人情。其序言所涉及“地理国家”是“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1]。书中大量职官术语构成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词汇系统，不仅是研究中亚、南亚及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珍贵语料，更是极具挑战性的翻译对象。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界对这一经典文献进行了多次系统性英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传教士汉学家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英国领事官员托马斯·沃特斯(Thomas Watters)以及当代中国学者李荣熙(Li Rongxi)的译本。

在面对同一套复杂的职官系统时，三位译者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翻译选择。过去的研究多侧重于史地考据或翻译技巧的准确性评价，往往忽略了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核心，其主体人格与创造意识如何介

入术语的重构过程。职官术语的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对等，而是译者在理解、阐释和重构文本时，受共时性制约(如当时的学术规范、出版要求、目标读者接受度等)与自身知识结构共同作用的综合体现。本文旨在以译者主体性为理论框架，对比分析三个译本中职官术语的译名演变，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与规范制约下的译者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异质文化之间进行意义的再造。

2. 译者主体性三维度下的职官术语英译

在传统翻译观中，译者常被视为“隐形”的中介，其职责被局限于对原文的“忠实”复刻。然而，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地位得到了重新审视。学者许钧对译者主体性和翻译主体性的解释是：“所谓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即译文的价值。而‘翻译主体性’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2]

在本研究中，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阐释的自主性，即译者基于自身的知识储备与专业背景，对唐代行政体系的官阶职能进行的深层认知解读；创造性重构，即译者根据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水平与时代语境，对具有浓厚历史积淀的职官词汇进行的“二次创造”与策略选择；主体的受动性与能动性平衡，即译者主体性并非盲目的任意性，而是在尊重原文客体限制与共时性学术规范的基础上，通过艺术人格的自觉实现意蕴的传递。

2.1. 阐释自主性驱动下职官术语从“行政映射”向“学术规范”的认知位移

译者的阐释自主性是指译者基于自身的知识储备、职业背景以及对源语文本的深层理解，对职官职能进行的认知解码。职官术语的转换并非简单的词典对译，而是一个受到译者个人知识结构、认知图式以及当时出版要求深度制约的复杂认知过程。

以唐代核心职官“尚书左仆射”为例，“尚书左仆射”在唐代三省六部制中居于核心地位，其译名的演变勾勒出译者主体阐释从“行政映射”到“学术对位”的逻辑路径：

Beal (1884): Left Vice-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State Affairs

Watters (1904): Left P'u-she (a high official)

李荣熙(1996): Left Vice-Presi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ffairs

塞缪尔·比尔(Beal)将其译为 Left Vice-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State Affairs [3]。作为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比尔的翻译活动深受当时维多利亚时代出版要求与目标读者接受度的制约。其翻译《大唐西域记》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对东方佛教典籍的系统性整理，旨在为当时西方学界提供一份可供阅读与研究的文献。比尔在阐释时发挥了自主性，利用 19 世纪英国读者熟悉的 Board (委员会/部)与 Vice-President (副总裁/副长官)进行功能性补偿。在比尔的认知图中，大唐的行政逻辑必须通过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话语进行适度调适，才能在西方读者的认知中重构出一幅可理解的行政肖像。这种归化调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术语的异域原真性，却顺应了当时目标读者的接受习惯。

托马斯·沃特斯(Watters)选择了异化策略：Left P'u-she [4]。与比尔不同，沃特斯曾长期担任英国驻华领事官员，其翻译工作带有鲜明的近代汉学特征，强调严谨性与制度的实证性。沃特斯的主体性表现为一种对行政权力运作纹理的敏锐捕捉与实证考据欲望。他拒绝使用任何西方官职进行简单套用，而是通过音译强制读者进入唐代语境，并辅以详尽的历史考据。这种阐释方式体现了学者主体对中国官制独立性的尊重，以及将翻译视作深度学术解剖的自觉。沃特斯在行使阐释自主性时，遵循了当时严复式的实证考据学术规范，对早期译本中的过度归化倾向提出了修正。

李荣熙将其译为 Left Vice-Presi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ffairs [5]。作为资深翻译家，相较于比尔，李荣熙选用 Department 替代了 Board，这反映了当代译者在主体性发挥上的精准化与科学化倾向。他利用现代政治科学术语进行学术对位，既纠正了早期译本过度西化的偏差，又避免了音译带来的传播障碍。李荣熙的学术对位过程是在批判性审视前人范式基础上的专业选择，在保留已被学界公认的学术术语的同时，修正了早期译文中的部分偏差，在国际通用学术规范与文化原真性之间找到了平衡。

三个译者对“尚书左仆射”的翻译差异，源于其不同的职业视域与时代规范：比尔的传播者身份导向了“行政映射”，沃特斯的官员背景促成了“实证还原”，而李荣熙的当代学术规范意识则推动了“规范化对位”。由此可见，阐释的自主性并非凭空产生，而是译者知识结构与时代表审美共同作用的结果。

2.2. 创造性重构驱动下职官术语从“地方治理映射”向“全球学术话语”的目的转型

创造性重构体现了译者在面对源语文化缺陷时，如何在目标语语境中进行意义的再造。这种重构并非随意的词汇替换，而是在特定的翻译目的、出版要求与预期受众的驱动下，对具有浓厚历史积淀的职官词汇进行的策略性选择。在《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西域各国中，由于地理远隔与政体差异，其地方管理职能往往呈现出军政合以的模糊性，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为译者留下了阐释空间。

以西域各国管理职能中军政合一的职衔“都督”为例，三位译者展现了不同的重构逻辑：

Beal: Governor-General (Tut-uh)

Watters: Commander-in-chief/Military Governor

李荣熙: Area Commander

比尔将“都督”译为 Governor-General (附注 Tut-uh) [3]。作为 19 世纪英国的传教士汉学家，其翻译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当时英国海外行政管理经验及目标读者阅读习惯的影响。在比尔的翻译实践中，唐代对西域的管辖模式被映射到了当时西方读者熟悉的行政框架中。通过 Governor-General 这一译名，比尔行使了功能性调适的主体能动性，旨在为 19 世纪的西方读者构建一个具备可读性的行政管理形象。

沃特斯根据上下文职能，将其区分译为 Commander-in-Chief (统帅)或 Military Governor (军事长官) [4]。这种去模糊化的处理体现了其作为职业汉学家对权力运作纹理的敏锐捕捉。沃特斯的主体性发挥在于其对客观事实的追求，他试图剥离术语在文本叙事中的模糊性，通过专业化的界定还原其真实属性，以满足当时专业汉学界对精确知识的需求。

李荣熙采用 Area Commander [5]。这一译名更具现代学术与管理学色彩，体现了当代译者追求学术中立性的主体倾向。他有意地将“都督”通过高度标准化的技术词汇进行转换，构建出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中国古代职官肖像，这与其身处当代国际学术传播语境下，追求专业性与高效跨文化传播的目的相契合。

“都督”一例，折射出翻译目的与目标读者接受度对译者能动性的导向作用。比尔在 19 世纪末的翻译是一种顺应目标读者认知习惯的功能性调适；沃特斯在 20 世纪初通过实证考据实现了向“专业知识构建”的转向；而李荣熙在 20 世纪末的重构，则标志着译者在当代学术规范下对客观性与专业性的追求。这种位移不仅是翻译技巧的更迭，更是跨文化知识建构方式的演变。

2.3. 受动与能动平衡驱动下职官术语从“权力干预”向“主体回归”的立场演变

译者主体性并非盲目的任意性，它始终受到原文文本(客体)的严谨性制约。正如查明建所言，译者的主体性也受到客体的制约和限制，即原文文本，否则就会变成“任意性、盲目性” [6]。在处理《大唐西域记》中极具政治色彩与文化深度的术语时，三位译者展现了在“受动”与“能动”之间的平衡。

在《大唐西域记》的叙事中，玄奘对君主的称谓蕴含着特定的礼仪与政治秩序考量。这些称谓不仅界定了各国君主与大唐的体制关联，更折射出不同文明体系间的交流。以皇权称谓“陛下/天至尊”为例，译者主体的立场演变尤为显著：

Beal: His Imperial Majesty/Heavenly Sovereign

Watters: His Majesty/The Devaputra

李荣熙: His Majesty/The Heavenly One

在处理“陛下”时，比尔采用 His Imperial Majesty [3]，试图通过西方政治修辞传达大唐的至高地位。然而，比尔同时受到了玄奘原文真实性的严格制约(受动性)：在面对“天子”等具有东方哲学内涵的词汇时，他通过副文本(脚注)承认其与西方君主的本质区别，并保留了 Heavenly Sovereign [3]这种直译色彩的修辞。这种选择是为了平衡目标语读者的可理解性与源语文本的客体约束。

沃特斯的主体性表现为对文本客体严谨的实证态度。在处理称谓时，他另辟蹊径采用 The Devaputra (天子) [4]，敏锐地捕捉到“天子”一词在西域语境下与印度佛教词汇的关联，将翻译提升到印度学与汉学溯源的高度。这种主体性的发挥将翻译行为从普通的语言转换延伸至文明溯源的维度，体现了译者作为学者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

李荣熙的受动性体现了对当代现代学术规范与历史真实的双重服从。在称谓上，他克制地使用 The Heavenly One [5]，旨在还原“天”这一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排斥了外部神学话语对中国母体文化的过度干涉。李荣熙的主体性在此处体现为一种严谨的文化自觉，通过回归本土学术话语，维护了母体文化的原真性与主体地位。

“秘书著作佐郎”一职在唐代官制中隶属秘书省，不仅是行政职衔，更承载着中国古代“修史立言”的使命。三位译者在处理这一术语时，展现了从行政化映射到学术化重构的演变：

Beal: Assistan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in the Palace Library

Watters: Assistant Secretary in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李荣熙: Assistant of the Editorial Service in the Palace Library

比尔在翻译“秘书著作佐郎”时，延续了其归化策略，将其功能化译为 Assistan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3]，但在机构名称上保留了 Palace Library 以维持空间原真性。这种策略性妥协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在能动调适与文本客体约束之间的平衡，也折射出 19 世纪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认知图式。

沃特斯使用了当时英国文官体系中通用的“Assistant Secretary”[4]。这种极简处理本质上是主体在面对中国官职独特文化内涵时的一种受动性选择——他倾向于通过精简的职业称谓来维护实证价值。他以译文流畅性为代价换取对原文客体原真性的维护，展现了其作为外交官与学者对行政秩序的严谨态度。

李荣熙的译本则标志着学术规范的回归。他通过保留“Palace Library”这一具有文化标志性的机构名称，并选用“Editorial Service”[5]来对应“著作”，在现代英语语境下重构了唐代文官系统中学术型官员的文化肖像。与前两人相比，李荣熙的译文通过精准的词汇操纵，还原了该官职作为文化典籍守护者的本色。

通过对“陛下/天至尊”与“秘书著作佐郎”的考察可见，译者的能动性发挥与其对主体受动性约束(如原文客体、共时性学术规范与出版要求)的认知紧密相关。比尔在拉锯中实现了功能适应，沃特斯在考据中实现了文明溯源，而李荣熙则在当代规范中实现了学术本位的回归。这证明了职官术语的翻译是译者在文本客体与时代规范划定的边界内，行使阐释与重构的结果。

3. 职官术语英译从行政映射到学术考证再到文化回归的范式演变

百余年来,《大唐西域记》职官术语在三个典型译本中的范式演变,体现出译者主体性三个维度在跨文化翻译中的动态运作机制:职官术语的英译绝非简单的语言对等,而是译者在不同时代背景、知识结构、学术规范与翻译目的驱动下,行使能动性 with 应对受动性的综合结果。

首先,阐释的自主性决定了制度图谱的还原深度。比尔以传教士背景进行的行政映射、沃特斯以领事身份进行的实证还原以及李荣熙以文化自觉进行的规范化重构,证明了译者的认知图式与时代规范是影响术语解读的首要因素。其次,创造性重构反映了翻译活动的话语导向。职官术语的演变折射出从早期功能性调适向客观、中立的学术话语转型的历史轨迹。最后,主体的受动性与能动性平衡揭示了翻译活动的本质。译者在处理核心词汇时,始终在尊重原文客体真实性与发挥阐释创造力之间寻找支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跨越一个多世纪的译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场深刻的主体间性对话。沃特斯在对勘比尔译文的过程中行使了学术监督权,而李荣熙则在审视前人范式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学术语言重新确立了典籍翻译的客观标准。这种博弈与融合,使《大唐西域记》的职官系统在英语世界中经历了一场从“行政映射”到“学术考证”,再到“文化回归”的深刻转型。

综上所述,对《大唐西域记》职官术语英译百余年演变的考察表明,译者主体性是连接历史文本与现代语境的动态纽带。译者应意识到主体性发挥的边界,在尊重文本客体真实性与遵循当代学术规范的前提下,积极行使文化阐释权。面对具有浓厚历史积淀的职官术语,译者应超越简单的归化或异化之争,利用现代规范化的学术语言构建中国古典文献的准确表述,为典籍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与实践的镜鉴。

参考文献

- [1]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8-13.
- [3] Beal, S. (1884)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übner & Co.
- [4] Watters, T. (1904)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A.D. 629-645). Royal Asiatic Society.
- [5] Li, R. (1996) The Great Tang Dynasty Record of the Western Regions.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 [6]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21-26.